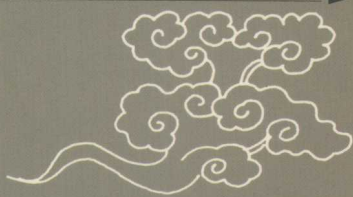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寅恪

『元白诗证史』

讲席侧记

刘隆凯整理

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寅恪[元白诗证史]讲席侧记/刘隆凯整理. —武汉:
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351-4150-1

I. 陈… II. 刘… III. ①元稹(779~831)-唐诗-文学
研究 ②白居易(772~846)-唐诗-文学研究 IV. I207.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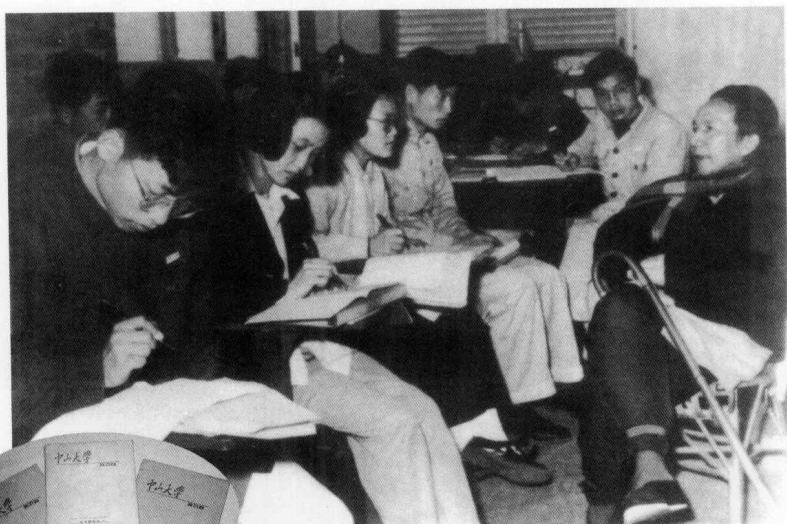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3205 号

出版 发行: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: http://www.hbedup.com	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:430015 电话:027-83619605 邮购电话:027-83669149
经 销:新 华 书 店 印 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(430223·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) 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 版 次: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:115 千字	3 插页 6.75 印张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-1 000
ISBN 7-5351-4150-1/G·3441	定价:1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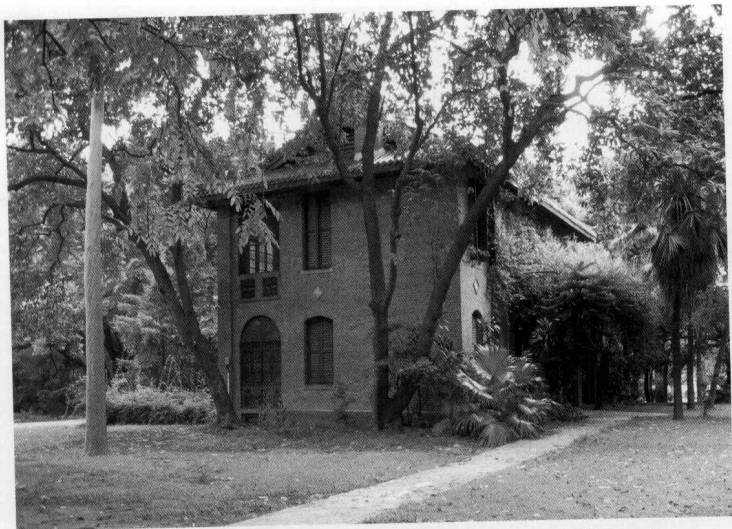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承印厂为你调换



1959年，陈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上寓所的北阳台上留影。



1957年3月8日，陈先生在寓所走廊内讲授《元白诗证史》时留影。



陈先生在康乐园东南区一号楼上度过了他生活中的最后二十年。不过，此处并非先生终老之所。动乱年代，先生被迫迁居西南区五十号的平房宿舍，并在那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。这是寓所前面的景象，门前小径，原先刷成白色，先生早晚常在此间散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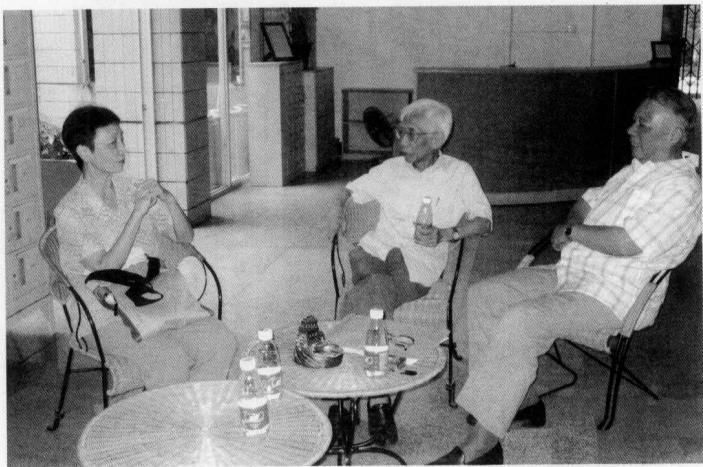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寓所背面的景象。二楼靠右的窗内，是陈先生的卧室兼书室；向左的两扇窗内，是二楼的内走廊，陈先生便是面对纱窗坐着，为面前的学生讲课。



陈寅恪与夫人唐筼。唐筼，字晓莹，为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。自1928年始，与先生相濡以沫，甘苦共尝，是先生事业和生活上的得力助手。夫人工诗书，先生专著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即由夫人题签书名。先生晚年作预挽爱妻之对联：“涕泣对牛衣，卅载都成肠断史。废残难豹隐，九泉稍待眼枯人。”寄寓生死相依之真情。夫人于先生逝后一个多月，即1969年的11月21日，亦黯然辞世，终年71岁。



陈先生逝世于1969年10月7日的清晨，享年七十九岁。先生墓地在庐山植物园内，墓地所在的山丘命名“景寅山”，墓石上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”为画家黄永玉所书。庐山和陈氏家族有缘。陈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晚年栖息于庐山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八十寿辰。如今陈先生永眠于匡庐，更为名山增胜。



2004年夏季，本书整理者在康乐园中拜访了陈美延女士和蔡鸿生先生。陈、蔡二位对本书的整理出版工作给予了诸多的关心与指导。此照摄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楼内大厅。左为陈美延女士，中为蔡鸿生先生，右为本书整理者刘隆凯，姜伯勤先生其时远赴敦煌讲学缺席。

目 录

1/整理者言	刘隆凯
13/元白诗证史	陈寅恪讲授 刘隆凯整理
15/一 莺莺传	
附录: 27/莺莺传	元 稹
32/梦游春七十韵	元 稹
34/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	白居易
36/古决绝词三首	元 稹
37/二 长恨歌	
附录: 52/长恨歌	白居易
54/长恨歌传	陈 鸿
56/霓裳羽衣歌和微之	白居易
58/马嵬行	刘禹锡
59/三 琵琶引	
附录: 76/琵琶引并序	白居易
77/琵琶歌	元 稹
78/泰娘歌并引	刘禹锡

79/悲善才	李 绅
81/四 连昌宫词	
附录: 92/连昌宫词	元 稹
94/五 新乐府	
附录: 165/新乐府并序	白居易
188/秦中吟十首并序	白居易
192/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	元 稹
199/金明馆教泽的遗响	蔡鸿生
205/《元白诗笺证稿》“以诗证史”之史的意义	姜伯勤
210/后 记	

整理者言

刘隆凯

一切都因为这三个练习本的存在。三个太普通的练习本，一个是浅白色的底子，两个是天蓝色的底子，上方都印有“中山大学”几个红字，下面都写着“元白诗证史”五个钢笔字，后面分别列出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的序号。其中标明（一）、（二）的两个本子都记得满满的，另一个标明（三）的天蓝色底子的只记录了两面多一点，后面都是空白。它们的存在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。其间人世的沧桑，难以尽述，没料想到它们居然历经坎坷而幸运的生存下来了。

有了它们，才有了这本陈寅恪先生《元白诗证史》的听课记录的公开问世。

—

这些听课的记录，应该说是弥足珍贵的。

因为，它所记录的，在陈寅恪先生并不短暂的大学授课生涯中，起着划上终止的句号的作用。特别是，这个句号又是打在不应该终止的地方。这是陈寅恪先生平生授课的最后一次，又是最后未能终篇的一次。

我深知，浅薄如我，记录必然存在众多的误漏，不能为大师传

神于万一。但是,后学的心是虔诚的,多少还是传达了大师说学问史的一些风采。我把这尘封也够久远的笔记整理出来,也是对陈寅恪先生的虽然迟到却依然虔诚的一点纪念吧。

我于一九五五年秋走进中山大学所在的康乐园。历史系为新生介绍老师时,在群星闪耀的教授群中,最显出异样光亮的是这两位:家学渊源、学识惊世的盲者陈寅恪先生,中年治史、蔚然大家的聋者岑仲勉先生。尤其是陈寅恪先生,声誉之隆,更令后生惊叹。及至新生造访两老,长者和蔼相待、劝勉有加,又令我们如坐春风。我曾写《我的瞎聋二师》(刊载于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《文汇报》)一文,追忆当年。一种仰慕,一种追求,融于我心,我期望自己能有幸走近大师。两年以后,我在进入三年级后终于如愿地选修了二老的课:陈先生的《元白诗证史》和岑先生的《隋唐史》。当时,别位先生的选修课都安排在教室里上课,只有陈先生的课是安排在他的家中授课。如今人们都很熟悉那位于校园中心的二层小楼了,陈先生住在楼上。二楼小客厅连着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,那便临时当作教室使用。靠窗那边安排了十来张课椅,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,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。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,带领我们透过时空的烟尘探求真实的过去。我也打开自己的笔记本,记下了一行又一行……

选修课开始的时间已难记确,大约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吧。那时,反右的运动大潮刚过,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上课秩序。开学后先有选报选修课、其后批准公布名单的事务过程,然后才开始上相关的选修课。选修课一周两节,一般都是连堂讲授。陈先生因健康关系,一周分上两次,一次只上一节课。我记忆当中他的课都在上午第三节,一次应该在星期三,还有一次不太记得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五,我印象中有些倾向后者。我的笔记,上学期记录了三十五次听课的内容,恰合十七周半之数。下学期记

录的是三十次听课的内容,只合十五周之数。这当中除开节假日的影响,更重要的还有临时政治活动的干扰,只是有关情况已无从记忆了。

选修课是结束于不该结束的时候。这种不幸并不是某一门课的,而是属于所有的课程。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热潮让校园又远离了平静。上面一个动员,全校停课下乡,投身跃进狂潮。我清楚记得,我们年级是下到东莞一个叫篁村的地方,参加双抢之类的劳动。我们没日没夜干活,田边插着“深翻三尺土,亩产万斤粮”的标语牌。有些同学其后还参加了公社史的编写工作。大约入冬以后才回到学校。上课是恢复了,原来中断的选修课却一律不再续开。所以,《元白诗证史》的中断乃是一种共有的不幸。它具体中断的时间,应当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夏天。我查看了笔记,恰恰在记录《黑潭龙》的内容时,我附记了一个时间:六月二十九日。而此后的《天可度》只刚刚开了个头,整个的讲授就中断了。查看内容,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节课。因此,我可以确切判定:《元白诗证史》的讲课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划上了句号,这同时也是给陈先生的授课生涯划上了句号。

《元白诗证史》罹不能善终之灾,实有其必然性。这门课程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,其学术价值始终为流行的政治观念所贬抑和曲解。一九五八年春季以后,批判之风更其猛烈,这门课程承受到的更多非难的目光。陈先生身处此境,其后一个阶段的讲课,酣畅自在的发挥力度,明显较前减弱。这从听课记录当中,多少也可以得到反映。此后又出现了名为“拔白旗”的运动,矛头直指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。当时上面有专文宣称,如同我们国家要超英赶美一般,史学界也要赶、超陈寅恪。陈先生理所当然地被定为首屈一指的大白旗,在康乐园中自然是口诛笔伐的重点对象。他的学术观点,还有这门选修课,都成为了粗暴批判的靶子。因为

名重体弱,他当时还能享受到背靠背批判的待遇。这种做法显然大大刺痛了老人的心。狂热批判之后,进而又是狂热的跃进:课一概停止,人一律下乡。康乐园一时弦歌不再,冷清凄凉。陈先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,他的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毕业离校后,听说校园又回复了平静,系里师生一再敦请陈先生继续开课,但他始终未加首肯。此后,他住所的长走廊上,不再出现弦歌不辍的景象。亲聆过先生最后一课的我们,真正感受到的,是自身的幸运,还是学术的不幸呢?

二

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,我有机会回到了睽违已久的康乐园。古榕葱绿照眼,惺亭风光依旧。校园中心区那所令我魂牵梦绕的二层小楼,又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风景似乎一如昔年。走近端详,我看到了岁月给予它的印记:二楼静悄悄的,大大的纱窗上沾着灰尘;门前那条曾被刷白的小道,已然露出了水泥的本色,路面还有着许多的裂痕。这让人压抑的冷清和孤寂,让我这个过来人想到了陈先生当年讲授《连昌宫词》时的情景来。小楼未必也是当代的连昌宫?也是,二楼的欢声笑语,门前的倚杖漫步,都已随风逝去。人说往事如烟,我的感受并不尽然。其后,我把自己对旧事的回想,写进了《往事不尽如烟》(刊载于一九九七年第四期《当代作家》)这篇文章中去。

岁月的流逝冲刷了我对许多旧事的记忆,不过,也仍然有许多往昔生活的片断,并未在我的记忆中完全褪色。陈寅恪先生授课的种种情状,仍然鲜明地留在了后学的心田。那是一帧永不褪色的人物写真:一位目不能视的瘦弱的老人,被扶坐在矮藤椅上。他用空茫的眼神扫视自己并不可见的前方。对面

三十来双眼睛都在静静地注视着他。他终于开讲了。他开通了时空隧道,引导后学神游于学术的天地中。无论探访往昔的幽胜或是莽丛,陈先生都能以自己超凡的历史思维,借助平常的史料,发掘出事件的本质内容。他似乎随心讲说,却是条理分明,由表及里,举重若轻。他举史事,说道理,援古证今,视野开阔。他的讲述发微见著,每多创见,却又浅出深入,点化后生,充分展示了这位学养精深的大师的智慧本色。一部唐史,其实又何止一部唐史,在陈先生的心中,已有如家珍般的亲密无间。自称“贞元朝士”的陈先生,平生最后开讲的《元白诗证史》,在研究的视角上,便显出了不同一般的特色,展开中又多出有出神入化的精彩,只可惜如今已是广陵绝响了。

我虽然对陈先生的选修课做了一点记录,对于陈先生的学说却仍然是一个门外汉,哪有什么评说的资格。我说的都只是自己一些历久未忘的印象。陈先生学品崇高自不待言,他的人品也同样崇高。在陈先生身上,精深与严谨、敏锐与独到,是同亲切与谦和结合在一起的。容我再说旧事:他初次见到新生,便和蔼地与大家交谈,教导大家要脚踏实地,安心学习,展现了长者仁爱与关怀的胸怀;他尊重岑仲勉先生,在讲课时,即使提到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的歧见,他也能以宽阔的襟怀介绍与称道对方;他对于后学的肤浅见解,也能积极引导,给予鼓励,让人终身受益。我在这方面更有着亲身的体会。在学习白居易的“新乐府”的过程中,我曾以《卖炭翁》中的一个问题请教陈先生。我之问与陈先生之答,在我的听课记录中都已具体写出来了。我要说的是陈先生对待此事所持的态度。我最初把问题写在纸上交给陈先生的助手黄萱女士,心中最好的期待就是黄萱女士在方便时能跟我解说两句。我开始没有听到回答。这也是我想到了的,浅薄之见也可以不予置理。不想,有一天,陈先生在讲课当中,突然换过话题,提到了我提

出的问题。大出我的意料,他出语就夸奖我,一再说我肯用心思考,真令我心潮激荡。然后,他平和地一条条说出理由,来证明我提出的想法是不必要的。最后,他又很谦和地说,他自己说的也未必一定对,还可以讨论。我的问题在陈先生心中明明是不成立的,他却着意对后学在态度上极力肯定,在认识上积极引导。他的关怀看似对我一人,我想,陈先生或许也是借此来启发年轻人,希望大家多去思考以寻求突破吧?先生的治学诲人,真如沧海之深沉广阔,春晖之温馨怡人,令后学铭感终生。我记下了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:一九五八年的六月三日。那天下课以后,黄萱先生特意领我进到近旁的书房,拿出线装的《两京城坊考》给我翻看。此情此景,至今印象鲜明。陈先生对此事的关心仍未了结:六月十四日,六月二十九日,他在讲课时又两次提到了我的问题。可惜整个讲课到此时也同时中断了,不然,陈先生也许还会第四次提到它吧?这康乐园中耳提面命、亲切教诲的一幕,已成为后学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。

三

陈先生为我们开讲《元白诗证史》时,他的相关著作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已经面世,是我们学习时重要的参读书目。先生所著之“稿”,显然是他所讲之“史”的学术基础,其以诗文证史的基本见解及考证论说的中心内容,在“稿”中都有明确的阐述。先生讲“史”,考虑到当时就学者的实际情况,在很多方面都作了基础性的解说和指点;当然,先生也就一些内容作了必要的发挥,以引导后学更主动地参与学习和进行思考。在内容顺序的安排上,“稿”与“史”也有不尽同处,如“稿”始于《长恨歌》,“史”则以《莺莺传》开篇。“史”之于“稿”,自有它的积极辅助作用在,但是,准确认识

与领会陈先生以诗文证史的治学特色,还是要以陈先生亲自写定并公开问世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作为依据。

当时在陈先生的课堂上,师生相处说得上是“三代同堂”。讲课的陈先生是第一代,听课的则有后面两代:金应熙先生算是第二代,年轻的助教和我们都是地道的第三代了。我们来听课,慕名的成分很大。与大师面对面,该是何等荣幸。自己到底又听进了多少,那就不好说了。我们这一代人,是在“厚今薄古”的熏陶中走过来的:薄古是肯定的,年轻人的历史文化素养与前辈不可同日而语;厚今其实并无真知,有的只是教条式的大道理。陈先生给我们讲课,实在有些为难他老人家;我们听陈先生的课,同样也是够为难自己的了。有着大家风范的陈先生真正不同凡响,对我们特别注意由浅入深的引导。在论史说事之时,时时不忘给予我们启蒙式的指点,让我们多少能从迷津中努力走出来。我们这才多少能够听得下去。我之勤于记录,并不是我领悟更多,恰是因为我领悟困难。我便认真听,仔细记,下去再对照参考书补充、改正,最后再把这课堂上下杂乱的记录和补充内容加以整理,转记在专门的笔记本上。我肯定会存在错记漏记的情况。错记比较好办,自己下去参看对照多少还有可能改正;漏记就不好办了,尤其那些特别专门的内容,自己听来完全生疏,事后全然无从补起,每每只好付之阙如了。这是令我十分遗憾又十分汗颜的事。

我就这样,用两个多笔记本记录下了自己大半年来听课的种种内容,我的喜悦和遗憾,充实和空虚,正确和谬误,全都真实地定格于那些笔记本中。走出康乐园后,生活给我安排了与专业史学研究无缘的工作,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中我自己又缺乏自我探求的信心和毅力,于是,几个笔记本静静地躺在旧书堆中,一躺就是近半个世纪。有幸的是,它不曾像有些书籍那样被付之劫火,居然能够在艰难中生存下来,这也是令我倍感欣慰的事。

我开始整理这些笔记,还是近几年的事。进入了人生的夕阳阶段,自己的时间充裕多了,便觉得不能再有负同学的期望了。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,与我有同窗之谊,他很早就希望我把这个笔记整理出来。他最初提出建议之时,大约是研究生刚毕业吧。等到我真的动手整理之时,他已是海内知名的史学专家了。我的整理工作一言难尽,似乎就是一个找错改错的过程。我自问记录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,已经改正多多,但我绝不敢保证,错误已不再有。一切的差错,责任在我。我当勉力消除此中的差错,一有发现,我再改正。如果四十年前我便着手整理,或许会比今天更得心应手些吧。

前年我趁南下看望在穗工作的女儿的机会,又一次访问了康乐园。我带去了最新整理的听课记录的复印件。在历史系办公室与姜先生话旧之时,适逢《广东社会科学》杂志社社长刘泽生先生和编辑江中孝先生来向姜先生约稿。姜先生就便介绍了我的整理稿。他们二位对此极表关注。去年年底,这个杂志选载了我的整理稿中的有关《莺莺传》的部分,很快《新华文摘》又对此作了转载。还是姜先生的介绍,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也对这个记录整理工作极表肯定之意,并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刘方女士选取整理稿中的有关《琵琶引》的部分,交由《唐研究》刊出。为着进一步提高整理质量,清除谬误,姜先生其后建议我与蔡鸿生先生联系,请他协助我审订记录内容。蔡先生高我两届,是我的学长。他和姜先生也都听过陈先生讲授的《元白诗证史》。姜先生曾告诉我,蔡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著述研读至深,很有见地。后来蔡先生以他的近作《仰望陈寅恪》惠我,我从中受益至深。我获得这样有力的支持,自问有信心把听课记录整理得更完善些。

这个听课记录之公开推出,我得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袁定坤先生和杨唐轩先生。他们认识到它的学术价值,决计用最理想

的方式使它公开问世。这也是他们在对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表示着自己的敬意吧。

四

我再应该介绍一下这个听课记录更加具体的状况了。

整个听课记录接近八万字。它由《莺莺传》、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引》、《连昌宫词》和“新乐府”(五十首)五个部分组成。陈先生讲授它们一共用了六十五个课时,其中上学期讲授了三十五个课时,下学期讲授了三十个课时。具体安排如下:

上学期:除总说用了一个课时外,《莺莺传》用了六个课时,《长恨歌》用了七个课时,《琵琶引》用了七个课时,《连昌宫词》用了四个课时,“新乐府”上学期用了九个课时。

下学期:“新乐府”继续又用了三十个课时,前后共计用了三十九个课时。

陈先生这次讲课,中止于“新乐府”中的《天可度》。他对这首诗也只是开了一个头,并未讲全。后面完全没有讲到的还有《秦吉了》、《鸦九剑》、《采诗官》三首。如果全部讲完,大约也只需要三两个课时吧。当然,陈先生此后肯定还会有总结性的专题内容要讲,还会讲几个课时便不好说了。至今想来,只怨苍天不遂人愿,那最后的精彩永远地隐于泉下了。

诚然,就全局的比例来看,《元白诗证史》未完成的部分十分有限。但是,不完整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好在有陈先生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在,听课记录欠缺的地方,只好借“稿”来作弥补了。

陈先生讲课的课时内容安排,主要是从我的听课记录中反映出来的。我当时用的空开一行的方式,区别不同课时的记录内容。